

环境伦理与空间治理专题研究

引文格式: 樊宏法, 沈灵娴.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 (4): 78-89.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樊宏法, 沈灵娴

摘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时性与历时性、质与量的辩证统一, 具有丰富的生态文明蕴含, 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服务于共同富裕的根本宗旨, 需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度、规范和引导资本行为、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关键词: 共同富裕; 生态文明蕴含; 党的领导; 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度; 资本行为规范;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作者简介: 樊宏法, 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常州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沈灵娴, 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环境公平理念及其空间建构方略研究”(20AKS0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环境公平的空间建构研究”(19YJA720005);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研究”(19MLB001)。

中图分类号: D616; D64; X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2.04.009

共同富裕主要致力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则主要致力于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总是互为中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人们对自然界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 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1]534}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 都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也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2]。

厘清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 剖析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相互作用机理, 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展有关共同富裕议题的致思路径, 而且对于推动和保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

尽管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 人们对于“共同”的范围和边界、“财富”的内涵与形式, 有着

不同的指称和确认,但是共同富裕作为特定共同体成员共享财富状态与结果的一种描述与追求,一般来说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中,社会财富的内容与总量,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体现和结果;财富共享的广度和深度,主要是生产关系变革和调整的结果。

生产力(包括实体性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以及非实体性的科技和管理等)的发展只是增加了社会财富的总量,为提高共同富裕的程度和水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即使是总体可支配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共同富裕了,也并不会必然地、自动地导致共同富裕。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往往可能会导致更大程度、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3]。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客观性的经济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724}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基本的,是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也是区分不同生产方式、判定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客观依据,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前提决定的。而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当其适应所有制性质的要求时,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到巩固和发展的作用;反之,就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到削弱和瓦解的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于共同富裕虽然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功能,但是两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共同富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包括政治民主、思想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多种建设协同匹配、相互促进的状态和结果^[4]。然而,由于社会结构因素的异常复杂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其实际过程与具体情形也是非常复杂的。一直以来,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问题上,都存在着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关系论两种不同倾向。

唯生产力论往往片面强调和夸大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机械地理解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性”,将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抽象为实证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自然科学和机械社会学,轻视生产关系调整和上层建筑变革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简化为像“铁的列车时刻表”一样运行的历史公式。第二国际时期的“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就将物质生产和经济条件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将自行走向崩溃和灭亡,社会主义将自动地、不可避免地走向成功和胜利。按照这样的观点,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也消失殆尽了。美国当代学者贝尔也认为,由于现代工业社会中广泛应用相同的科学技术和工程知识、相似的职业分类依据和社会管理技术^[5],技术-经济理性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性建构,“发展经济”将成为所有国家的中心议题,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右”之争、关于“革命”“阶级斗争”的话语,都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意义,旧有的政治热情将会衰竭,意识形态的论战将会终结^[6]。

而唯生产关系论往往片面强调和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能动反作用,轻视生产力的发

展,急于拔高或超前变革生产关系,认为公有制的程度越高就是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等同于具体做法,将公有制的结构形式等同于生产力的实际发展,将共同富裕的未来前景等同于现实的物质基础。由于忽视了生产力结构与要素的复杂性,尤其是忽视了生产力要素中人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传统的差异,纯粹的公有制形式、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近乎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影响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财富总量的增加。

对于将唯物史观曲解为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恩格斯晚年曾予以深刻批判。“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他指出,虽然经济状况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前提性、决定性条件,但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理论和观点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都对历史进程发生实际的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原理”,但“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的人,其中包括许多所谓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会用“经济必然性”来解释不同地区的制度差异、宗教差异甚至语言差异,从而不断“闹出笑话来”。恩格斯不仅将这些人嘲讽为“书呆子”,而且还对造成这种片面强调经济因素的“庸俗决定论”进行了自我审视,认为主要是由于他和马克思在反驳他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7]。

正是在批判和抵制第二国际“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8],批判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机械历史观,而且还采用了与十月革命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在经济很不发达的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反对庸俗生产力论和机械历史观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唯生产关系论的滋生和蔓延。苏联的“官僚社会主义”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我国极左路线盛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分缓慢,人民群众生活普遍困顿。改革开放以来,在反思和批判唯生产关系决定论的过程中,一些人又以我们曾经所遭遇的挫折、曾经经历的“共同贫穷”为依据,又提出了各种形式的庸俗经济决定论,总是强调只有先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总量,做大了“蛋糕”,才有可能和必要去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如果在“蛋糕”没有做大之前,就想着如何按照共同富裕的原则去切分“蛋糕”,就会影响人们做大“蛋糕”的积极性,就有可能又回到“共同贫穷”。

然而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真反思了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关系论的各自弊端,认识到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贫穷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3}这一完整、经典的论述,一直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邓小平同志一再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9]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往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无须讳言的是,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以及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也明显拉大了。正是有鉴于此,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国不仅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还制定了“迈出坚实步伐”和“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阶段性目标。

(二) 共同富裕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的历时性,是指实现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成,而是需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增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显露与发现,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都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原有基础条件有差异,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有先后、程度有差异。共同富裕的共时性,是指在任何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空间区域,促进共同富裕都不应该只是一种遥远的价值目标,而应该是一项现实的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目标和政策举措着力的方向;在当下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领域,不仅要自觉积极主动地解决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和收入差距问题,而且也要解决相同区域的企业、部门、单位等内部的收入差异问题。

“给所有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0],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其最终实现必然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和美好的社会制度,还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539},即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奋斗和逐步迈进的实际过程,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谈到康德的“善良意志”时曾经批判指出:“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11]211-212}

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也是如此,需要正确处理好“历时性”与“共时性”、“急不得”与“等不得”的辩证关系。所谓“急不得”,是指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要有充分的估计,不能好高骛远、操之过急,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幻想在朝夕之间就全面实现共同富裕,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加强科学谋划和顶层设计,制定阶段性目标和任务。所谓“等不得”,是指不能因为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因为我们曾经因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遇到过挫折,不能因为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就将共同富裕的目标“悬置”起来,或者是推至遥不可及的未来,就认为在当前阶段只能无所作为。而是要始终谨记,“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2],要通过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当作一项现实的任务,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完善制度配套、明确路径举措,自觉主动地将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共同富裕问题解决好,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才能“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13]。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人民收入的增加,“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而如果财富总量增加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了,发展的成果没有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没有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被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只能沦为一个口号,人民也不会相信的。

(三) 共同富裕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

共同富裕的质的差异性,是指共同体有区域、国家、阶级、集团、行业、职业、部门等差异,财富则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安全的、生态的等不同类型的,有物质与精神、机会与结果、权利与能力等不同的维度。共同富裕的量的差异性,是指共同体有大小、范围的不同,共享有广度和深度的差异,富裕的程度可以有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财富总量与人均个量、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等量的方面的差异。从质和量的统一来概括,共同富裕的内涵

可以界定为:特定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拥有“平等的追求富裕的权利、公平的实现富裕的机会、公正的占有财富的结果以及不断提升的创造财富的能力”^[14]。

共同富裕又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一般来说,共同富裕的指称对象主要是而且首先是物质财富,在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又会不断产生新的、更高质量的欲望和要求。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富裕和贫穷的类型与标准、质与量,都会呈现出差异性:在今天看来可能是非常贫穷的生活水准,古代人可能视之为非常富裕的生活,否则也不会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各种均贫富的主张和运动;而在发展中国家被视之为富足的生活,在发达国家可能处于贫困线上。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富裕”的客体除了以基本温饱需求的满足为前提外,通常都包含有其他类型与标准、质与量的组合,从而又体现出一定的绝对性。现代社会对于贫困和富裕的质与量的分析,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计算方法和衡量标准。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小康之家”最先主要是着眼于经济指标和生活水平,“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要实现这一目标,按照当时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要达到800~1000美元。而且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不能同西方比”。随着“小康社会”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人均产值的量化目标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意义,而转变成共同富裕的同义词,内在包含着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等不同的指标要素。并且,邓小平对此还非常自信地说过,如果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肯定比西方国家的2000美元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15]

二、共同富裕的生态文明蕴含

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共同富裕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呈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时性与共时性、质与量辩证统一的特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经济社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一)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前提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进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肉体、毛发、骨骼、血液等都来自自然界。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不仅给人类提供了食物、燃料、衣着、住房等各种形式的生活资料,也给人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产资料,如肥沃的土地、茂密的森林、丰富的矿藏等。

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自然界的一切,如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不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源泉,是人得以享用、加工和消化的精神食粮的来源,并成为人意识的重要内容^{[1]161}。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同整个自然界紧密联系,与自然界构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自然界在亿万年的进化演变中,所产生的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没有替代品,一旦遭到破坏,而又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和及时的修复,人类社会就难以存在和发展。和谐、稳定、可持续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永恒

的、必要的前提性条件。只有不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二) 自然环境资源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自然界的环境资源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从而也是物质财富的第一源泉。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是它所创造和拥有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人的劳动才有附着之处,才有用武之地,才能创造出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客观的外部世界,人的劳动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的环境资源是人类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展开自己的活动、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所需产品的源泉。因此,自然界与劳动都是使用价值的源泉,都是财富的源泉。不仅如此,人的劳动力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力,人本身在生产劳动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人的劳动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而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物质或者消灭物质,并且他在这种改变物质形态的劳动过程中,还要经常地依赖于自然力本身的帮助。

自然力也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和重要体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存在着一种思维上的误区,即一谈到生产力,总是习惯性地将其归结为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又习惯性地将其简化为科学技术、劳动工具、管理技术等,而忽视了劳动对象这一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自然力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构成与体现,如肥沃土壤的生产能力、河流瀑布的运输能力、茂密森林的净化能力等等,都能够影响到生产的效率和产业的特色,影响到财富的总量和类型。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两者共同构成了社会财富的来源。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的情况下,资产者往往将自然界当作他的私有物品来处置和对待,忽视或假装没有看到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财富的第一源泉,片面夸大劳动的作用,硬要给自己的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将自己的劳动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而正是由于劳动的这种自然制约性和外在条件性,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财产或生产资料的人,才不得不为那些已经“成为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去从事雇佣劳动^{[11]428}。资产者拥有更多的财富,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但一定意味着他占有或者消耗了更多的自然资源。贫富分化总是同占有和消耗自然资源的多寡密切相关。

(三) 生态环境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自然生态系统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前提性条件,是内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的。由于人口的增长、科技的片面应用、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与落后技术,尤其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污染转嫁与生态殖民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日趋严重。随着生态系统的再生产能力和生产的外在自然条件不断遭到破坏,也“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6]580},增加了资本积累的成本,影响利润的实现和再生产的进行,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会重新开启对于生产资料和财富源泉的各种争夺,反过来又加剧了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叠加效应,不仅影响到财富的质量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严重地危害到人类的生存。

生态危机会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一旦生产条件的生产能力和财富的第一来源遭到破坏,不仅会形成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还会引发国家的立法危机、政府的政治危机以及社会危机。因此,现代社会的安全保障,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愈来愈多地包括作为我们物质生活基础的环境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土壤、水源、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17]。假如这些作为生产条件的生态环境资源出现短缺和退化,国家的

经济基础最终将衰退,社会的财富总量将急剧减少,社会组织会逐步蜕变,政治结构将会变得不够稳定,国家内部将会发生骚乱。因此,生态环境风险的高度多样性、复杂性和破坏性,已经成为社会进步与繁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威胁;生态环境领域的斗争,也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场所和议题。

(四) 生态环境危害加剧贫富分化

生态环境恶化对于贫困者的危害更大。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8]。但是当遭遇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情况时,贫富程度不同的地区、群体和个体,所受到的损害是不一样的。富裕的地区、群体和个体,由于占有和消耗了更多的人均自然资源、产生和排放了更多的人均环境污染,从而拥有更多的财富,也就比贫穷者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去自由地选择规避环境风险和环境危害的形式和地点。而贫穷者往往由于缺乏经济实力,不得不忍受各种污染物的侵害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疾病的折磨。例如,在一些煤炭储存丰富的地区,由于不合理的资源价格、无节制的开采计划、低门槛的环保规制,开采者、贩卖者、购买者往往攫取了大量的经济财富,却造成了当地地形地貌和地下水系的严重破坏,留下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富有者们纷纷选做良好生态的环境移民,而从开采中获益甚少的当地百姓则长年累月地忍受着贫困和污染的煎熬,甚至沦为环境难民和经济难民,并由此而诱发出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带来严峻的挑战^[19]。

三、共同富裕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特征,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而要保证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其服务于“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宗旨,需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路径。

(一) 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方向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牢记初心使命,顺应新时代发展潮流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前人长期奋斗的基础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所要全面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我们知道,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主要是凭借其早发优势和技术优势,通过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来完成其资本原始积累,通过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掠夺全球资源,以支撑其现代化进程和富裕生活。而我国的现代化则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起始条件和时空境遇中展开的。一穷二白的底子、规模巨大的人口、较低的人均资源禀赋、复杂的国际局势等,给我们如何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了一系列严峻、复杂的现实挑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继续发挥巨大的思想优势、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加强整体规划能力和协调统筹能力,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政策举措和工作部署之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民心民智民

力,带领、动员和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

中国的事情要办好,中国共产党的事情首先要办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已经写入我国《宪法》修正案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制度优势。而要真正发挥好这一制度的优势和效能,就必须办好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就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原则,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质量发展;就要完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就要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站在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担负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决做到令行禁止,确保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能够落地见效;就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就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二) 坚持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度,巩固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贫富分化的形成与消费资料和劳动收入的分配,固然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仅仅着眼于消费资料和劳动收入的调节,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0]436}。形成贫富分化的真正根源,在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0]563}。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两条,“一是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占绝对主导地位;二是每走一步都注意不使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是要走全国各地区、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9]172},就可以保证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习近平总书记也再三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21]。

作为自然禀赋的环境资源资产,既是生产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和财富的第一来源,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永恒基础,具有典型的人类性、整体性和公共性,与通常意义上的私人生产资料的“产权确定”,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有坚持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才有可能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和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宪法》对于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做出了明晰的界定。总纲第六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总纲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真正统一、推动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创设了必要的法理前提。

但是,需要注意和警醒的是,国家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而不是说采用了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必然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国家所有制,但在实际上却是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私有制。恩格斯曾经批评指出,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

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20]558-559}。只有在国有制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表现形式,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和要求,只有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清晰合理,并且又能够置于民主监督之下,真正地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才能真正成立。但是,无须讳言的是,我国在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方面,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所有者设置虚化、所有权边界模糊、管理者权力过大、监督缺位乏力、国企高管收入过高等现象,导致了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法律上明文规定为公共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往往变相地转变为某些资本集团的私有财产,全民所有的公共财富来源反而难以造福于全体人民^[22]。

坚持自然资源资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须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提高制度效能,加强顶层设计,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创新产权制度,落实所有权,区分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利和管理者权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监管职责,保障全体人民能够分享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收益。要建立和完善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国家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全面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彰显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巩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三) 规范和引导资本行为,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目标

资本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要素,但是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的是,增值或赚钱是资本的本质特征,是资本运动的唯一目的。资本内在地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属性,从而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资本在追逐利润的无限运动过程中,能够不断促进社会的分工协作,将巨大的自然力和科学技术纳入生产过程之中,从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财富数量。“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3],并且为未来社会全体成员的高水平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20]87}。但是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规制和监管的情况下,资本的无限积累、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形成资本垄断甚至是金融垄断或寡头垄断,并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控制着国计民生的命脉。在资本的逻辑中,没有什么自在的、自为的、高尚的、合理的存在,它能够把包括人格在内的一切东西都贬低为追求利润的手段,同时又总是希望减少费用的支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6]871}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和人的实际需要,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和利润的增加。在资本的眼中,自然界被当作一个可以操纵和控制的对象,整体性的、具有丰富感性光辉的自然,被分割和通约为可以定价的、具有交换价格的、能够自由买卖的商品。对于资本来说,“无偿接受来自环境、大气、水等的环境资源,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在生产过程中把污染的大气、水排放到环境中,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环境被破坏的结果,资本的逻辑是毫不关心的”^[24]。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具体实例之中,也不是表现在某些具体环境政策工具的有限作用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根本性对抗之中^[25]。

但是,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分配总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从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总是会有不同

的作用和功能。资本也是一样, 总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 受到社会制度属性的影响和制约。资本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 包括与生态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在内, 往往都是由特定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的斗争状况、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官僚政治的现实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26], 其逐利的本性虽然不会改变, 但是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 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和激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大创造, 有着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但是更有着“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的价值导向和制度规约。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资本的一般特性与行为规律, 一方面, 要持续深化各类生产要素流动型开放的体制机制, 支持和鼓励各类资本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出来,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另一方面, 要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 认识到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及其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注重生态安全, 设置生态红线, 规范和引导资本行为,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 有效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27]。要加快自然资源资产及其产品的价格改革, 加强对自然垄断环节的价格监管, 完善价格决策程序和信息公开制度, 防止资本利益集团对公有自然资源资产的侵蚀和掠夺。要理顺自然资源资产及其产品的税费关系, 加快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加强和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强化生产者的环境保护法律责任, 健全环境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制度、评估方法和实施机制, 提高各类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成本, 对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将“谁污染, 谁治理”“谁损害, 谁补偿”的原则落到实处, 解决一直存在的“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不合理局面, 以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平。

(四) 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促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良性互动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依据不同地理空间的自然属性和资源状况, 以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为基础, 完善空间格局规划, 进行有度有序开发, 以推动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格局,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国土空间辽阔, 地形地貌复杂, 气候类型多样, 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很低, 空间分布极不均衡, 适宜开发的面积较少, 生态系统也较为脆弱, 自然灾害频繁、威胁较大。随着我国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一些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职责的区域, 将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 而将提供农产品、服务产品尤其是工业产品作为从属功能。这样的举措可能会使原来就存在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则是落实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 基于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基本原则和利益导向, 根据生态产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 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 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一种制度安排。生态产品既包括具有生态服务价值、提供生态屏障功能的生态产品, 如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体、安全的土壤、良好的生态、美丽的自然等, 还包括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生态标签或环保标签的各种物质产品。完善生态产品的价值补偿和价值实现机制,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完善

纵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级政府制定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对具有重要生态屏障功能、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核算生态产品价值,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贴上“价格标签”,完善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机制。地方政府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通过多种形式统筹生态领域的转移支付资金,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支持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保护修复工程;通过增设符合实际需要的生态公益岗位等方式,对主要提供生态产品地区的居民实施生态补偿。二是完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按照“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原则,完善区域之间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推动区域之间的绿色协调发展,促进区域之间的共同富裕质量。三是完善生态化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通过建立和规范生态化产品的认证评价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积极打造生态化产品知名品牌,推动生态化产品认证国际互认,加大生态化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提升生态化产品的社会关注度,通过多种方式扩大生态化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经营开发收益,不断推动生态化产品的价值实现。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通过“谁受益、谁补偿”来实现良好生态产品供给的正外部性内部化,通过“谁损害、谁赔偿”来实现生态环境负外部性的内部化,能够推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良性转化与互动,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不断发展,能够引领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的社会风尚,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方案,塑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格局,有利于从源头上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推动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59.
- [3]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 [4] 逢锦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共同富裕百年奋斗的理论与实践[J].经济学动态,2021(5):8-16.
- [5]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7.
- [6]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63-466.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594.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23.
-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12]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9):4-18.
- [13]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J].求是,2019(10):4-16.
- [14] 洪大用.扎实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议题[J].社会治理,2021(2):10-14.
-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9.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王正平,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20.
- [18]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123.
- [19] 王芳.环境公平问题与社会管理创新[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0(5):577-583.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3.
- [22] 樊宏法，沈灵娴.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规定探析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3）：92-100.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7-928.
- [24] 岩佐茂. 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 [M]. 2版. 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48-149.
- [25]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M]. 耿建新，宋兴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
- [26]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M].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5-246.
- [27] 孙全胜. 马克思空间政治批判的三重视角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1）：76-88.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Fan Hongfa, Shen Lingxian

Abstract: A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alism,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e relation, synchronicity and diachronism, quality and quantity, which has rich implic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s intrin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serve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regulate and guide the capital activity,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mplic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blic ownership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s; regulation of capital activity;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收稿日期：2022-06-08；责任编辑：陈鸿）